

主 编 陈金钊
执行主编 周 怡

黄海学术论坛

HUANGHAI XUESHU LUNTAN

第四辑



上海三联书店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主办

主 编 陈金钊
执行主编 周 怡
副 主 编 吴文新

黄海学术论坛

HUANGHAI XUESHU LUNTAN

第四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海学术论坛,第4辑 / 陈金钊 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9

ISBN 7-5426-1989-6

I. 黄…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748 号

黄海学术论坛 第4辑

主 编/ 陈金钊

责任编辑/ 刘宏伟

装帧设计/ 范岍青

责任制作/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3) 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5

印 数/ 1—700

ISBN7-5426-1989-6

C·68 定价 49.0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建军

副 主 任 韩圣浩 陈金钊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牛林杰	作从巨	刘玉殿	刘 明
孙迎春	孙武安	张东辉	张 平
李树来	姜爱丽	常晓梅	梁文玲
董文毅	谢 晖		

目 录

文学研究

- 论比较文学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胡志明(1)
- 共和国诗歌发展演变简论石兴泽(18)
- 都市民间: 90年代以来大陆都市小说研究的新视野
——以王安忆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都市小说创作为例.....聂 伟(30)
- 无处是阑珊——论白先勇小说的情调与审美价值陈敏杰(46)
- 鲁迅的《过客》《起死》与易卜生的《凯蒂林》《我们死者醒来时》...陈玲玲(57)
- 中西两种“实用观念”的交锋——试谈“问题与主义”论战双方的
思想基础孟文博(72)
- 中唐诗歌的转型: 大历诗人创作论张银堂(80)
- 论晋宋之际的政治转型与文学革新吴怀东(90)
- 凯特·肖班笔下的女性反叛形象.....蔡 谨(102)

文化传播研究

-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史春风(108)
- 论作为一种媒介权力的大众文化孟鸣岐(117)

语言修辞研究

- 钱钟书的文学修辞理论高万云(131)
鲁迅辩难文中的逻辑问题张江艳(140)
语助词“呢”是句子分类标记吗?马道山(150)

宗教与艺术

- 仙道思想与中国虫画周 怡(157)
像教、变像与变相俞晓红(169)

东北亚文学与文化交流

- 试论韩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的审美观——以朱耀燮的《母亲和厢房里
的客人》和蔡万植的《痴叔》为主李永男(184)
流浪诗人金笠及其讽刺诗研究李忠实(190)
《祖堂集》卷一校读记詹绪左 温振兴(199)
日本文学中扭曲的性与爱蔡春华(207)

东北亚政治文化研究

- 中日两国“抗日战争”历史文本的叙事学分析研究
——以中日两国现行小学社会课教科书为例郭雯霞(217)

寻找与拒绝：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阅读	王一强(233)
-------------------------	----------

哲学·政治研究

解读康德对传统神学理念的批判	杜镇远(244)
论邓小平关于正确对待领袖的思想	张文军(254)
论可持续发展实践过程的困境	马春霞(261)
西汉初年王国政治的运行	赵 沛(273)
行政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范广垠(282)
从科学发展观看休闲建制	吴文新(289)

法律·经济研究

论立法的正当程序	汪全胜(298)
法律的权威：一个虚构的谎言	张利春(312)
浅议企业营销中的客户关系管理	宣 锋(328)
企业生态位理论：现代企业竞争的新视野	韩国圣(334)
无船承运业务在中国的发展及相关政策建议	夏 辉(339)

研究生论坛

《赵氏孤儿》悲剧性的现代解读（笔谈）王宪华、苏鑫、李慧、司雯、范蕊、梁香伟(344)	
从网络聊天语言看会话合作原则违反之语用意义	周 艳(360)
义务理论视角的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	黄海燕(367)

以人为本与求真务实的方法论探讨·····	孝青利(376)
----------------------	----------

学术会议纪要

多学科对话 互动式研究 ——“首届中国修辞学多学科高级学术 论坛”综述·····	郑 媛(382)
全国“新世纪汉语写作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	陈海燕(390)

论比较文学中的民族主义问题

胡志明*

在许多比较学者看来,民族主义与比较文学是一对互不兼容的概念。实际上,比较文学不仅在起源上与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从这门学科发展至今的一百多年历史来看,它从来就没有真正摆脱过民族主义倾向。本文意欲通过对两者内在的本质联系的梳理,来具体说明,民族主义不仅是比较文学学科最初建立时的逻辑起点,而且还是这门学科得以不断发展的内在的驱动力,它也将伴随着这门学科历史使命的最终完成。

一、民族主义与国别文学史

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确切地说,它直接地是由风行于十九世纪的国别文学史研究衍生出来的。欧洲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具体的文学史,特别是国别文学史研究,只能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后的事。这与欧洲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特征有关。无论在古代,还是中世纪,甚至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罗马帝国,或者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版图中的欧洲人来说,世界(欧洲)一体性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们最容易产生的是世界主义,或者说是欧洲主义

* 胡志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硕士生导师。

的观念,法国的“启蒙作家……无一例外都是人文主义者,同时又都是世界主义者”。^[1]德国的“莱辛与赫尔德、克洛普施托克与维兰德、歌德与席勒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2]许多学者习惯于采用世界(欧洲)一体化的视野,来考察一些局部性或地区性的文化事物,在这种普世性观念的主导下,欧洲很难出现真正的国别文学史的研究,因为后者有赖于现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成熟。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民族主义的产生,来自于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压力。启蒙理性的张扬,使得个人自由的思想深入人心,然而要实现个人自由,还需要诸多的条件,其中,“民族独立被看作是获得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3]这一点在德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与“狂飙突进”表现得最为典型,这两场运动都把个人自由的实现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独立的观念传遍全欧,又与欧洲当时的政治情势相关联。具体地说,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强烈的“文化地震”,迫使人们把自己所属的国家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保障自己应对激烈动荡的政治变化:紧随其后的拿破仑战争不仅宣告了形式上依然还在的欧洲一体化的终结——1806年法兰西皇帝与俄罗斯沙皇联手废止了“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号,同时还以侵略与反侵略的对抗形式,激发了欧洲各国普遍的政治民族主义的觉醒,“当这位法兰西皇帝最终在滑铁卢败北后,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欧洲正在跨入一个新的纪元:此时,最重要的事务就是按民族重新组织欧洲大陆”。^[4]这个新的纪元“实际上就是整整一百年随心所欲的民族主义运动”。^[5]

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在各国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爱国主义,并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推广,其中以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尤为激烈,当时许多诗人与学者都把文学与民族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英国批评家卡莱尔说:“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其历史、政治、经济、科学和宗教史的精髓”,并称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存在方式的最真正的标志”。^[6]法国第一个真正的比较学者戴克斯特后来也说:“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是主要地通过自己的文学来寻求赋予自身以一种民族精神。”^[7]文学与民族主义精神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已成了当时普遍的文化共识,文学成了人们强化民族精神、呼唤并表达民族情感的最重要的依据与方式。全欧性的浪漫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运动的互动关系,是人所皆知的,它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欧洲各国国别文学史研究的兴盛。

戴克斯特说:“十九世纪是一个民族文学史发展和自我确立的世纪。”^[8]

从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学者掀起了一股撰写本国文学史的热潮,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追溯本国的民族精神之渊源,梳理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之脉络,以弘扬民族精神,振奋民族自豪感。这种国别文学史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诗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截然不同,如盖尔维鲁斯在其《德国民族诗歌史》序中所言:“我与对事物的审美判断无关: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纯文艺的批评家。”R.韦勒克后来指出:“在十九世纪德国的智力舞台上,美学与文学研究的分离,成了它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前者是一种哲学的学科,诗学就隶属于其下;后者主要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史沿着民族的路线日趋专门化……”^[9]文学史研究的这一本质特征至关重要。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文学史家们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由于欧洲(特别在西欧)早年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特征,后来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实际上都无法写出一部纯粹的本国文学史,因为欧洲历史上许多作家和作品内容普遍存在着“跨国”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文学研究应运而生。1832年法国比较学者维尔曼就说:“没有这种比较研究,文学史将是不完备的……”^[10]梵·第根说得更加直白:“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它名为‘比较文学’。”^[11]当代美国比较学者乌·维其坦因也指出:“我们这门学科最初仅仅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的。”^[12]由此产生的比较文学理所当然地会把国别文学史研究的宗旨——民族主义,作为其学科建构的一块基石。创办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梅兹为其刊物拟定的秘密格言便是:“民族性与一个人的个性一样,应当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3]后来有许多人一厢情愿地把比较文学视为对民族主义的反抗,或者是“针对民族主义的一帖解毒剂”(antidote),英国当代著名比较学者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这说法只是一种“神话”,因为“比较文学的根是深深地扎在民族文化土壤里的”。^[14]可以说,比较文学学科与其“史前史”文学比较区别的根本界限正在于此。民族主义不仅规约着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初模式,而且还无形地制导着它后来的发展趋向。

至于当时实证主义和一些以“比较”命名的自然学科的影响之所以会被比较文学接受,只是由于它们可以满足学科的某些内在的需求,恰如巴登斯贝格所言:“它从(生物学)中发现了一种(比较)的倾向,这种倾向有助于活跃文学史的各种研究。”^[15]我们知道,比较文学学科确立的标志是以实证研究为特色的法国学派的形成。法国学者通过对以“影响”的事实联系为根本对象的

实证研究的强调，不动声色地把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摒弃在学科门外，美其名曰是为了实证，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骨子里则是视比较文学为文学史研究的补充，认为其研究的“新的成绩……在获得之后便应该作为本国文学史全体中的一部分”。^[16]其实平行或跨学科研究，在历史上就属于比较研究的范畴，科赫曾在其主编的比较文学杂志的“导言”中予以充分肯定的^[17]，法国学派将它们摒弃在外，此举也蕴含着深刻的民族主义动机。

在比较学者身上，我们更能看到比较文学与民族主义的天然联系。早期出身于国别文学史研究的比较学者，其比较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不言而喻的；即使“那些站在国家之间的十字路口上”的比较学者，如韦勒克所枚举的贝茨、巴登斯贝格、E.R.库提乌斯、A.法里内利等，他们也“常常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18]法国学者贝茨，曾一再重申学界前辈圣伯夫的话：“任何一个献身于比较文学的人，首先就要摆脱民族偏见和所有的沙文主义。”但是接下来的话马上便把他自己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倾向表露无遗：“尽管无人能够质疑歌德的同样的论点，即是德国文学组建起了世界文学的大家园，然而，法国应当被认为是现代比较文学史的学术源地和中心。”^[19]贝茨这段话中所蕴含的已不仅仅是想通过比较文学来张扬民族精神的那种民族主义，而是要在整个比较文学界凸显法国中心的民族主义，后来果然在欧美比较文学界形成了法国中心主义。其实这种心态在许多国家的比较学者中普遍存在，只是他们实在无力真正付诸实施罢了。这样的动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比较文学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苏珊·巴斯奈特认为，十九世纪中期，法德两国的民族地位强弱不同，必然会导致这两个国家比较文学观（perspectives）的明显差异：“比较文学从一开始起就与民族主义联结在一起，所以无需为它作为一门学科分别在法国和德国的发展竟然有如此的不同而感到惊讶。”^[20]可以说，这门后来被称为要“跨越”或“超越”一切民族界限的学科，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就已经携带着令许多人讳莫如深的民族主义基因。

二、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尽管民族主义与比较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思想基点和内在动力，但是人们都对此讳莫如深，因为进入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已被人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搅在了一起，特别是后来的

纳粹主义,更是把它弄得有些声名狼藉。为了让比较文学有个冠冕堂皇的身份,人们更愿意借重于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概念,以强调它的世界主义倾向。从巴登斯贝格的《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到艾金伯勒的《比较不是理由》,都一再强调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新人文(道)主义”,其实就是想以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概念中所蕴含的“世界主义”,来替换名声不佳的民族主义,以此为比较文学正名。基亚则提供了论据:世界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三个阶段,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第二阶段,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则是第三阶段:“比较文学是由世界主义文学的觉醒而产生的”。^[21]皮埃尔·布律内尔等的《何谓比较文学》更是强调:“我们的比较文学工作者在1800年前后诞生于思想的和社会的世界主义。”^[22]

我以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确实为比较文学开拓了无限美妙的发展前景,而且有些功劳应该记在它表面上的“世界主义”名分的账上,因为这至少使比较文学看上去不再那么刺眼了。但是真正能够把原本作为国别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补充的比较文学,从西欧范围,推广到整个世界,进而成为一门能够引导民族文学走向理想的世界文学的“显学”,其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世界文学”概念中同样也蕴含的民族主义基因。诚然,歌德早年确实具有(欧洲)世界主义倾向,就像当时法德许多自称是人类之代表的启蒙家一样,但是,那只是一种单纯而幼稚的不自觉的世界主义。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是在十九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时,经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和对拿破仑战争的体验,特别是经历了全欧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洗礼,歌德形成了自觉的“世界主义”,不仅因为它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欧洲的疆域,注意到了东方文化的民族特性,而且因为它是建筑在诗人对民族文化差异性深刻理解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歌德是在充满了对德国民族落后状况的深切焦虑的前提下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可以说,无论是他的世界主义,还是“世界文学”概念,本质上都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

首先,歌德是在确认民族文学的前提条件下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我们都非常熟知1827年1月31日歌德对爱克曼所说的那番话:“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其实,歌德并非想跳过民族文学,要大家直接进入世界文学,恰恰相反,他说这番话的用意,是劝德国学者以更远大的视野来更好地建设民族文学,因为之前,他还如是说:“……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

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23]所有这些话，又都是他在刚刚读了中国文学作品后的有感而发。这更说明歌德的“世界文学”直接来自于诗人在真正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对民族文化差异性和德国文学独特性的思考，所以他最后还强调，德国文学应当把其他民族“好的作品”中的“可取之处……吸收过来”。^[24]易言之，没有民族文学的确认，恐怕不会有世界文学概念。当代一位美国学者指出：“两千年来，直到歌德的后期著述中才出现世界文学概念”，这是因为到了歌德时代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25]

其次，歌德所提出的是一种能够包容民族文学各自个性、并且能够相互宽容的“世界文学”。德国学者科赫在其创办的比较文学杂志的“导言”中，曾引了歌德的一段话：“人们将会通过所有（文学）的独特形式，包括它们的民族性或个性特征的形式，包括它们历史的、神话的、寓言的，或者多少是发明的形式，看到这种（世界文学）的光辉愈来愈清晰……无论如何，每一个民族独有的特色都必须被意识到需要加以保存，并通过它们去进行交流。”^[26]歌德还有更为明确的论述：“我们仅仅要重复的是，这（世界文学的）概念并非意味着各个民族应当认为是相同的，而是指，他们应当学着去互相理解，如果他们不在乎相互关爱的话，至少他们也要去学着互相宽容。”^[27]“只有当各个民族开始了解所有民族之间的所有关系时，普遍的世界文学才可能发展。”^[28]从中我们不难读出，歌德始终把世界文学与他对民族文学的重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文学理想的实现，有赖于所有民族文学的自觉与成熟，即使将来理想的实现，民族文学的个性仍然会有它的价值和地位。美国学者维斯坦因也认为：“歌德真诚地希望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在互相交流与互相认识的过程中得以维持。”^[29]韦勒克的表述更为形象：“这是一种要把各国文学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而每个国家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30]

复次，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渗透着他对当时德国（文学）的难堪处境的焦虑。我们大可不必由于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太体面，而歌德又是伟人，就讳言歌德有民族主义情怀。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的兴盛，是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中，德国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由于其民族统一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一运动在德国也最为深入普及，歌德当然不可能置身于其外。他自己也曾坦

然地承认：“您可别以为我对自由、人民、祖国等伟大思想无动于衷。不，这些思想就在我们心中，它们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摆脱它们。我也总把德国萦怀在心中。每当我想起作为个人如此值得尊敬而作为整体却那么可怜的德国人民就感到切肤之痛。把德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相比，会使我们感到羞愧难堪。”^[31]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歌德正是在其民族主义情怀的驱动下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1827年，歌德在讨论塔索剧作的译本时，谈到了世界文学概念与德国民族的关系：“……我仅仅是想让我的朋友了解我的信念，一个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其中有一个荣耀的角色是留给我们德国人的。所有的民族将评价我们的工作；他们赞赏、诘难、认可和抵制，模仿和误解我们，向我们敞开或关闭他们的心灵。”^[32]歌德一直在要求当时的德国人能够“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因为当时他清楚地看到，法国人获得长足的进步，是由于他们摒弃了狭隘和排外的观点。^[33]他苦口婆心地劝勉当时的德国人，要想赶上并超过法国人，根本的途径就是走出民族的狭隘性，具备“更宽广的视野”——世界文学的视野。个中的民族情怀很容易令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怜其不幸，怒其不争”之语。

由于引入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比较文学的研究在多个层面上得到了改造：使这一研究的价值取向由（国）内转而向外；使得它在对已有的事实联系的研究中呈现出面向未来的趋向；使得这门（西欧）区域性的文学研究获得了普世性的价值；使之从（国别文学史）婢女地位中挣脱出来，进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些改造所以能够发生，准确地说，世界文学概念所以能够与比较文学研究一拍即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两者都把民族文学作为它们认识和研究文学的出发点，并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点——民族主义。当代西方学者指出：“在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系统提出和法国、德国及英国……早年那些系统研究的比较学者背后，存在着比较哲学和单个的民族文学研究的开拓性工作。不过后者特别依赖于先前的民族国家的巩固，尤其依赖于由法国大革命所唤醒的在欧洲的普遍出现的民族主义。”^[34]因此，世界文学概念不仅不可能把比较文学中的民族主义置换成世界主义，恰恰相反，正是它的进入，客观上却激活了或强化了本来就隐匿在比较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基因。

第一，世界文学概念使比较文学成了民族文学通向世界文学途径或手段，就是要把民族文学作为基本单位，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到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都是以民族文学为基本单位的，探讨

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基本法则。任何个别的文学现象，它们所以能够进入比较学者的视野，首先便是因为它与另一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着民族（语言）上的差异性。这种对民族文学重要性的强调，当然是以对民族主义的承认为前提的。

第二，歌德的世界文学强调保存并展现民族文学的个性特征，而真正能够在比较中发掘并展示一个民族文学个性特征的只能是本民族的比较学者。一个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实际上就是以另一民族文学为参照，在与本国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行着日趋深入的对话。在他国文学的参照下，比较学者对本国文学的民族特性总会获得全新的理解和认识，这容易激起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应，并且也会使其研究自然地呈现出民族主义倾向——着力于展示本民族文学对于其他文学的优越性，或者为本民族文学客观存在的劣势性而痛心疾首。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像科赫、贝茨等一些起先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比较学者，何以后来居然都成了保守的民族主义者。

第三，既然歌德在论述世界文学概念时，也无法避免优先考虑德国文学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一般的比较学者自然更难以免俗了。为了能让本民族文学在将来的世界文学体系中占据一个显要的地位，比较学者在比较中或者竭力发掘本国作品的普世性价值，以便使其能在世界名著（masterpieces）行列中也占据一席之地；或者更注重描述本民族文学对他国文学的影响，以显示其优越性。这恰恰证明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动力往往来自于民族主义。

第四，比较文学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许多文学或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纷纷加入其中，包括远在另一半球的东方国家，这首先应当归功于歌德的世界文学宏伟蓝图的极大魅力。其实正是世界文学的蓝图所诱发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了许多国家的学者加入到比较文学行列的第一驱动力。由于获悉“世界文学”可能正在形成，而比较文学又是通向那里的最佳途径，每个学者都不会眼巴巴地看着本民族的文学可能被拒斥在外而无动于衷，每个学者都希望本民族文学将来能在其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那么，加入比较文学便成为他们理想的首选。反过来，这更加剧了比较文学的民族主义倾向，一方面在世界文学蓝图诱导下，每一个学者自然把比较研究的重点放在本国文学；另一方面，“今天每一个民族都在要求自己的‘世界文学’……现在每一个民族都是出于一种充分的理由或另一种理由，认为它自己的文学要优越于所有其他民族。”^[35]也就是说，在不同民族的比较学者心中，世界文学的图景同样被染上了不同的民族特色。

三、比较文学的“危机式”发展与民族主义

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细细勘察它走过的足迹，人们在感慨之余，不免会有几分惊奇：很少有哪一门学科会像比较文学这样，居然是在不断的“危机”声中，毫无惧色地迅速膨胀，现在几乎成为一门世界性“显学”；而且在它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未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东方、包括许多曾饱受西方殖民奴役的后殖民国家，居然也都接受了它。比较文学的这种超常态的发展模式，其实都与其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基因有着内在的联系。

比较文学的第一次危机，来自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对它学科属性的断然否定。克罗齐列举了三大“罪状”，除第一条属于“比较”之名的方法论的批判，后两条都与其民族主义倾向有关。克罗齐认为像科赫等人所做的无非是在为本国民族文学寻找一个更悠久更荣耀的“祖先”，“我也能够为意大利的（文学）历史编纂做同样的论证和列表工作……我们意大利要比德国更为古老……”。他据此认为，“比较文学史”完全可以去掉作为累赘的“比较”二字，应该就是“文学史”。^[36]其实，克罗齐在诘难比较文学民族主义倾向时，他自己同样也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反民族主义的动力往往也是来自于民族主义。

克罗齐的抨击引起了法国比较学者的警觉，他们在承认比较文学确实“曾为其（文学的民族主义）而作出贡献”^[37]的同时，开始从几个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修正工作，突出学科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以抹除比较文学中的民族主义痕迹。在巴达庸和巴登斯贝格的奠基工作之后，梵·第根更是从实证主义的角度，为影响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学科规范。法国学派由此而莫立。其实，法国学派的这套东西，在德国不可能建立，因为它实质上是建筑在近三百年来法国文学在整个欧洲的优越感基础上的。梵·第根不仅把莱辛等德国学者所擅长的且已相当成熟的跨学科研究挡在门外，还将德国人所热衷的与中古文学的比较研究视为不正宗，因为法国人无需像德国学者那样还要为本国文学寻找历史渊源或祖先。这一饱含着民族主义动机的作法，在强调客观性、实证性和科学性的名义下，不动声色地使法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界占据了正统的霸主地位，而曾与其旗鼓相当的德国比较文学从此一蹶不振。“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重建了比较文学，但它的建立似乎只能围绕着法—德轴心，……德国的比较文学远远落后。”^[38]法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在两个维度上表明了比较文学的民族